



两汉魏晋
凉州政治史研究

张灿辉
著



岳麓書社



两汉魏晋凉州政治史研究

张灿辉 著



岳麓書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两汉魏晋凉州政治史研究/张灿辉著. —长沙:岳麓书社,
2008

ISBN 978 - 7 - 80665 - 744 - 7

I. 两... II. 张... III. ①政治制度—历史—研究—
武威市—两汉时代(前 202 ~ 220)②政治制度—历史—研
究—武威市—魏晋南北朝时代 IV. D691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8)第 003433 号

两汉魏晋凉州政治史研究

作 者:张灿辉

责任编辑:马美著

特邀编辑:彭 霞

封面设计:胡 颖

岳麓书社出版发行

地址:湖南省长沙市爱民路 47 号

电话:0731—8885616(邮购)

邮编:410006

网址:www. yueluhistory. com

2008 年 1 月第 1 版第 1 次印刷

开本:890 × 1240 1/32

印张:8. 75

字数:260 千字

ISBN 978 - 7 - 80665 - 744 - 7/G · 618

定价:20. 00 元

承印:湖南广播电视大学印刷厂

如有印装质量问题,请与本社印务部联系

电话:0731—8884129

前 言

传说在黄帝之时,中国的先民们尝划野分州,建置万国,虽年代久远,无从考稽,但中国传统区域之划分已渐露端倪;降至战国,《禹贡》兴起,分野九州,尚不见凉州之名,然其所属地名于雍州之域就有,据《汉书》卷二十八《地理志》云:“黑水、西河惟雍州。弱水既西,泾属渭汭。漆、沮既从,酆水迤同。荆、岐既旅,终南、惇物,至于鸟鼠,原隰氐绩,至于猪野。三危既宅,三苗丕叙。”而据专家考证,“黑水”、“弱水”、“鸟鼠”、“三危”等山水名均在后来的凉州境内。秦立郡县,沿长城西北以置陇西、北地二郡;但凉州之大部分郡县是在汉武帝用兵匈奴以后才设置的,据史载,汉武帝元狩、元鼎间,击败匈奴右部以后,于匈奴浑邪王、休屠王故地置酒泉、张掖、敦煌、武威、安定、天水等郡;又驱退西羌,置金城、武都郡;元封五年设十三州(部)刺史,其中凉州统陇西、金城、天水、武威、张掖、酒泉、敦煌、安定、北地、武都,凡十郡,是以凉州之名始见矣。平帝元始四年,强取西羌之地以置西海郡,但旋复为羌人所占。其时西汉外戚王莽已执政柄,渐改汉制,将凉州改为雍州。自王莽乱汉,群雄并起,而凉州之西羌诸部乘机作乱,东汉光武帝建武十二年,中原朝廷对被羌人所据的金城无法行使治理权,故省金城而属陇西。并沿用前汉旧制,恢复十三州刺史,废王莽雍州之名,仍以凉州统西汉之旧域,即陇西、汉阳、武都、金城、安定、北地、武威、张掖、酒泉、敦煌十郡,又张掖、居延两属国。灵帝时,又增置南安、汉兴二郡。降至魏晋,以陇右与河西之地理组合的凉州日益受到中原政权之分割,汉献帝兴平元年,凉州数有乱,而河西诸郡去州隔远,乃以河西四郡为雍州,治于武威,并增置西海、西郡属也。而凉州尚统金城、陇西、汉阳、武都、安定、北地、南安、汉兴八郡,嗣后又先后增置永阳、新平、西平三郡,共统十一郡。雍、凉二州于是乎分焉。建安十八年,诏并十四



州为九州,以复《禹贡》之旧,于是省废凉州,以诸郡并入雍州,直到建安二十五年。魏文帝黄初元年,曹丕代汉建魏,分雍州复置凉州,统金城、西平、武威、张掖、酒泉、敦煌、西海、西郡等八郡,治左城。晋武帝泰始五年,以雍州之陇右五郡及凉州之金城、梁州之阴平置秦州;太康三年罢秦州并入雍州,七年复还秦州。至此,两汉之凉州便因地理之分野而割裂为陇右之秦州与河西之凉州了。元康元年,惠帝分敦煌郡之宜禾、伊吾、宜安、渊泉、广至等五县,分酒泉之沙头县,又另立会稽、新乡,凡八县而置晋昌郡。永宁中,张轨为凉州刺史,镇武威,上表请合秦雍流民于姑臧西北以置武兴郡,又分西平而置晋兴郡。张寔分金城之令居、枝阳二县,又立永登县,合三县而置广武郡;张茂分武威、金城、西平、安故为安州;张骏分武威、武兴、西平、张掖、酒泉、建安、西郡、湟河、晋兴、广武,合十一郡为凉州;兴晋、金城、武始、南安、永晋、大夏、武威、汉中,共八郡为河州;敦煌、晋昌、西域都护、戊己校尉、玉门大护军,三郡三营为沙州。张祚又以敦煌郡为商州,永兴中又置汉阳县;张玄靓改为祁连郡;张天锡又别置临松郡。后凉改昌松为东张掖郡。其后李暠为西凉,建都于敦煌;秃发氏为南凉,建都于乐都;沮渠氏为北凉,建都于张掖,依次分割河西诸郡。此是两汉至魏晋时期凉州建置之始末也。本书所述之凉州政治,亦大体依此辖域沿革而论之。

毛泽东在《沁园春·雪》一词中曾说:“惜秦皇汉武,略输文采。”大意是说秦始皇、汉武帝等风流人物文学修养水平不高。然而,在中国统一多民族国家的奠定与发展史上,秦皇、汉武之功不可没。秦始皇建立统一的封建专制主义中央集权国家,设郡县,废分封,并北进河套、修筑长城,兵指江南、以服岭南;至汉武帝时代,又北败匈奴,使中原王朝之疆土渐渐伸展于草原游牧地带,经略西南夷,攻取南越,促进了江南之经济与文化开发,从而确立了中国封建社会前期之稳固疆域,直至隋唐时代,均无多大改变。

一般说来,中国古代专制政体之产生与发展必须依靠一个固定的地域与一个较为广泛的社会政治基础,但这一地域与基础并非在边境

地区。也就是说,在中国封建专制皇权政治之演生进程中,边境地区是无法在这个政治演生舞台上扮演特别重要的历史角色的。然而,凉州地区因处于中原帝国政治兴替的坐标轴上,故而,在逐鹿中原者眼中看来,凉州之得失于皇权政治之产生关系綦重。自秦凭崤、函之固的关中之地统一六合以后,西汉帝国亦以关中之长安为其政治心脏;是后,东汉、曹魏、西晋等,虽都于洛阳,但仍将关中视为至关重要的政治平台,并以此来加强对山西世界的控制与治理,自然对凉州之政治军事势力刮目相看。东汉中后期之羌乱,朝廷将议放弃凉州,时具有远见卓识的大臣认为,弃凉州则“山陵阨外”,关中则为边境,山东危困。又顾祖禹在《读史方輿纪要》卷六十三“甘肃镇”条中云:“昔言:欲保秦陇,必固河西;欲固河西,必斥西域。”这些均说明凉州在中原皇权政治之发展序列中之重要地位与巨大作用,而这种特殊的政治关系又为凉州政治势力之演绎注入了接连不断的历史活力,使凉州地域政治军事势力的发展呈现出阶段性与连续性,并时时与中原皇权政治之间保持着紧密的接触。

同中国古代之其他边境地区一样,处于“斗绝之地”的凉州在承平之时,主要承担的是保疆扩土的军事任务,隔断羌胡之“交通”,维系传统的草原“丝绸之路”,成为山西世界的主要战略前沿。然而,在凉州之政治势力结构中,虽然以汉族为主要群体,但并非单一的群体。特殊的种族环境,使凉州之地域势力结构具有多民族性的特点。就少数民族群体而言,因为中原皇权政治奉行“非我族类,其心必异”的种族歧视政策,是以凉州地区的绝大多数族群是与中原皇朝格格不入的,故而成为王朝的征讨与压抑的对象。然而,这种征伐政策之奏效亦并非始终如一的,当帝国承平之际,因足以维系其对边境地区的统治地位,故而,凉州之羌胡之乱,哪怕是东汉中后期之巨大规模的“羌乱”,均无法摆脱种族之间的统属结构,更何况越是强大的帝国,就更加重视对凉州之控制,并从凉土的少数族势力中寻找军事资助。是以自汉以来,我们可以见到许多少数族武装纷纷纳入帝国之军事编制体系中的材料。而这一做法便加强了凉州地区汉族与少数族之间的军事、政治与



经济联系,促进了凉州地区的社会开发与以汉族群体为主体的民族融合。魏晋之际,中原皇权荡灭,“五胡”纷纷款塞,入主中原,然在凉州之地,却仍然建立了前凉张氏政权,独立于中国北方之诸胡部族政权环视之中;凉州之少数族诸部依然附于汉人政权之下,彼此之间谋求着共同的发展道路。而随着苻秦对凉土用兵的历史性胜利,便大大地改变了凉州地区的种族结构,少数族势力因此而崭露头角,渐渐地成为主宰凉州政治发展的重要力量。后凉、南凉、北凉政权的相继出现,便是凉州少数族势力之政治生命的充分体现。然而,由于各少数族势力的分散与弱小,故而这些政权都无法支配着凉州之政治发展。

凉州地域势力因为处于独特的军事政治环境,故而具有迥异于山东地区的地域社会风采;自汉以来,山东世界文教复兴,士大夫们纷纷附庸于经学与玄学,故而文化色彩浓厚。从而使自先秦以来的传统地域格局便逐渐地成为山西重军功,尚武力;山东重家学,崇文化。立都于中原洛阳之地的帝国,一方面依靠山东文化士大夫维系中央权力中枢机构的运转;另一方面又不得不将戡平内乱、外征四夷之军事征战任务倚重于山西军事集团,同时却又忌讳此种军事势力之人主朝廷。特别是关东之士大夫,对“无学术”的凉土士人显露出极大的轻蔑与巨大的抵触。东汉末年,董卓率凉州武力入主洛阳,山东豪族纷纷起兵,以“除奸”为己任,迫使董卓之凉州集团硬生生地退回关陇。前秦灭亡凉州张氏政权以后,前凉末主张天锡于淝水之战后只身南逃江左之东晋政权,但在重人文,尚玄谈的江南士族眼中,“以其国破身虏,多共毁之”。东晋之皇帝及其权臣贵戚虽“常延致之”,但目的是“以为戏弄”,并不将之纳入江左士族之格局之中。后来,张天锡在清贫中死去。西凉李氏政权为北凉沮渠氏灭亡以后,李凉子嗣李重耳亦曾“脱身奔于江左”,而后来却北投元魏,这也许是因为地域背景之所致。

在研究凉州政治势力之产生与发展的过程中,我们不难发现,自两汉乃至魏晋之际,除了陇右之隗嚣外,其他政治风云中的领头人物均来自于关中之地,窦融如此,后来的张轨、李暠亦如此。之所以造成这种状况,其原因是多方面的。客观地说来,中国古代之封建王朝于

边州边郡治理,大多起用内郡之士大夫出任该域之地方长官,并由此而征辟该域士人为僚属。王朝处于治世之际,该地之势力便成为中央集权之维护者,若中原王朝内乱泛起,该地之士人则往往附从其长官之政治归宿。故而,秦末之真定赵佗称雄南越,王莽末之窦融控制河西,东汉末之公孙氏据有辽东等,无一不是如此。然而,造成由外来势力控制边地之主要原因乃边地势力之政治非成熟性所致。就凉州而言,构成其居民主体的汉人则大多来自于关东之贫民、罪犯、谪吏、逃亡等,他们都是中原皇权政治的抛弃者,无缘于当时帝国政治与经济权益的垂青,亦无法得到文化学术之惠顾,故而,即使他们构成了凉州之主要居民群体,并在本地之各项事务中不断地发挥着日益重大的作用,但其政治的、经济的、文化的热力凝聚时间相当长远,其社会演进过程亦相对迟缓。因此,在两汉、魏晋之际,中原皇权政治衰微或集权体制出现危机之时,凉州之地域势力便显示出政治上的幼稚与不成熟性,对皇权政治之兴替既缺乏整体的把握,又无法在凉州本地的政治风云中充当领袖人物的角色,加之与关中地区紧密之政治联系,是来自“三辅”之地方豪族纷纷入主凉土,从而使凉州之政治发展具有极大的依附性。然而,这是历史的一时缺陷,进入“五凉”历史后期,凉州地域势力的政治色彩渐趋浓厚,他们在当时的社会政治风云中日益觉悟起来,并逐渐地摆脱对关中势力的依附地位。但要说明的是,凉州本地势力成为凉州政治之真正主宰者,其时却已至唐代中期,张议潮之归义军运动便标志着凉州势力的正式成熟。

由此可见,在中国古代统一多民族国家的发展史上,凉州之地占有相当重要的席位,虽然它回归于统一大家庭的时间颇晚,且其经济与文化进程略逊于内地。然而,独特的地理环境与人文风貌以及特殊的军事背景,使凉州成为当时衡量中原王朝治乱兴衰的临界面,是反映中国古代民族融合与区域经济开发的一面历史反光镜。而且,从西汉以降,凉州成为沟通传统草原之路的枢纽,草原之文明、南亚次大陆之文化均通过该地传至中原,而中原固有的文明亦因此而西传,远播地中海地区。至西晋灭亡以后,这里又成为中原传统文化的保留地。



由此可见,两汉、魏晋时代,既是中国大历史由统一走向分裂割据的重要时期,也是凉州地域势力之形成与壮大时期。这一时期,凉州地区之政治集团组合,均无一不与中原皇权政治之演变相生相息;而这种相互呼应的结果,最后便导致凉州地区霸权政治的出现,“五凉”的历史便是这种政治的衍生物。基于此,拙不揣浅陋,将两汉与魏晋时代之皇权政治兴替与凉州政治势力联系起来进行考察,冀求勾勒其演变轨迹及其内在规律。且综引前贤之成说,囿囿此书,又因学识有限,不足之处颇多矣,祈请师友指正。

目 录

001 / 前 言

001 / 上编 两汉卷

003 / 第一章 秦汉之际凉州的居民分布

003 / 第一节 凉州,先秦之民族走廊

006 / 第二节 羌族的家乡

017 / 第三节 匈奴帝国与河西

020 / 第四节 西汉与匈奴间争夺河西走廊

027 / 第二章 西汉时代的凉州

027 / 第一节 凉州郡县机构的设置

036 / 第二节 构建凉州的防御边塞

042 / 第三节 移民以实凉州

056 / 第四节 两汉间凉州的游牧部族

063 / 第三章 东汉时代的凉州

063 / 第一节 两汉之际的陇右隗嚣集团

085 / 第二节 东汉初期的河西窦融集团

098 / 第三节 东汉之“羌乱”始末

125 / 第四节 羌乱与凉州地方势力之勃兴

148 / 第五节 董卓时代与凉州势力的发展



下编 魏晋卷

175 / 第一章 三国时代的凉州

175 / 第一节 凉州势力与曹魏政局

189 / 第二节 蜀汉政权与凉州

199 / 第二章 西晋时代的凉州

205 / 第三章 “五凉”政治时期

206 / 第一节 前凉政治研究

226 / 第二节 后凉政治研究

233 / 第三节 南凉政治研究

244 / 第四节 西凉政治研究

253 / 第五节 北凉政治研究

270 / 后 记

上编 两汉卷





第一章 秦汉之际凉州的居民分布

第一节 凉州,先秦之民族走廊

从中国浩如烟海的史籍中,似乎可以窥探出秦凉地区与中原文明之撞击有着颇为久远的历史轨迹,远古之考古遗迹暂且不论。自夏以来,由于该地是东西方交通大道,又是青藏高原与蒙古大草原的接壤地带,所以,东来西往、南下北上的许多部族均在此留下了历史的足迹。这足以说明这里是一个多民族、多部族活动的频繁地带,是构架中国传统文化发展壮大艺术长廊。

大夏是在先秦时代就活跃于黄河中上游的古国,《吕氏春秋·古乐篇》曾载上古时代的黄帝与大夏之交通,其言曰:“昔黄帝令伶伦作为律。伶伦自大夏之西,乃至阮隃之阴,取竹于嶰谿之谷,以生空窍厚钧者,断两节间,其长三寸九分,而吹之以为黄钟之宫。”又班固《汉书·律历志》与应劭《风俗通·音声篇》等亦同记此事,且“阮隃”均作“昆仑”。而《史记·封禅书》还记载春秋之齐桓公曾“西伐大夏,涉流沙”,则大夏一国应在中国之西北方。然而,见于《左传·昭公元年》的材料却载大夏一国之方位又在今山西境内。其书云:“后帝不臧,迁閼伯于商丘,主辰,商人是因,故辰为商星。迁实沈于大夏,主参,唐人是因,以服事夏、商。”杜预注曰:“大夏即晋阳县。”《史记》卷三十九注引《史记正义》云:“《括地志》云:‘故鄂城在慈州昌宁县东二里。’按与绛州夏县相近。禹都安邑,故都在县东北十五里,故云在大夏也。”此大夏乃由夏后氏之故墟而得名。

王国维曾就此论断:“大夏本东方古国,《逸周书·王会解》云:‘禹氏骑騊,大夏兹白牛,犬戎文马。’又伊尹《献令》云:‘正北空桐大夏。’空桐与禹氏(即月氏)犬戎皆在近塞。则大夏一国,明非远夷。《史记·封



禅书》云：‘齐桓公西伐大夏，涉流沙。’此本《管子》佚文。……综此二说，则大夏当在流沙之内，昆仑之东，较周初王会时已稍西徙。《穆天子传》云：‘自宗周（麋）水以西，至于河宗之邦，阳紆之山，三千又四百里。自阳紆西至于西夏氏二千又五百里。自西夏至于珠余氏及河首千又五百里。自河首襄山以西，南至于春山珠泽昆仑之邱七百里。’是西夏氏西距昆仑二千又二百里，与《管子》、《吕览》所记大夏地望正合。……《大唐西域记》云：‘于阗国尼壤城东四百余里，至睹货逻故国，国久空旷，城皆荒芜。’宋于阗国姓实为尉迟，而画家之尉迟乙僧，张彦远《历代名画记》云于阗人，朱景元《唐朝名画录》云吐火罗人。二者皆唐人所记，是于阗与吐火罗本同族，亦吐火罗人曾居于阗之证。又今和阗以东大沙碛，《唐书》谓之图伦碛（《唐书·西域·吐谷浑传》，李靖等军且末之西，伏允走图伦碛，将托于阗。是图伦碛在且末、于阗间）今谓之塔哈尔马干碛，皆睹货逻碛之讹变。是睹货逻故国在且末、于阗间，与周、秦间书所记大夏地位，若合符节。《唐书·西域传》云：‘大夏即吐火罗。’其言信矣。大夏之国，自西逾葱岭后，即以音行。除《史记》、《汉书》尚仍其故号外，《后汉书》谓之兜勒（《和帝纪》及《西域传序》），六朝译经者谓之兜去勒（《婆沙论》卷九所云‘世尊极知兜去勒语，胜生兜去勒中’者）。兜去罗（《大智度论》卷二十五，见上），《魏书》谓之吐呼罗，《隋书》以下谓之吐火罗，《西域传》谓之睹货逻，皆大夏之对音。其徙葱岭以西，盖秦、汉间之事。希腊地理学家斯德拉仆所著书，记西历纪元前百五十年时，睹货逻等四蛮族侵入希腊人所建之拔底延王国。是大夏居妣水南，而大月氏居其北。此其侵略先后之次序也。此事，中国、印度、希腊古籍全相符合，则睹货逻一族，与月氏同出东方，可断言矣。”^①

根据《管子·小匡篇》记载齐桓公曾经“西征，攘白狄之地，遂至于西河，方舟投柎，乘桴济河，至于石沈，悬车束马，逾太行与卑耳之貉。拘秦、夏，西服流沙西虞，而秦戎始从”。案：春秋之时，北狄在今山西、陕西北部，西河则在今宁夏一带。由北狄至西河，这是齐桓公西行之路

^①参见王国维《观堂集林》卷十三《西胡考（下）》，中华书局1984年版。

线,经西河而西行至贺兰山,即“卑耳山”也,向西行“涉流沙”而至大夏。据黄文弼考证:“古时之大夏,必分布于凉州、兰州、河州一带。古时疆域广大,北与月氏接,南与空桐接。”而大夏迁往葱岭之路线则是“遵南道由东而西,形迹甚为显然。至何时西迁,疑当在西汉之初,或在月氏西迁以前也”^①。

前文提到的月氏人也是河西地区一个颇为强大的部族,其与中原之联系亦悠久而流长。据《史记·大宛列传》记载:“始月氏居敦煌、祁连间,及为匈奴所败,乃远去,过宛(今哈萨克斯坦南部的费尔干纳),西击大夏(今阿富汗西北的马扎里沙里夫)而臣之,遂都妫水(今阿姆河)北,为王庭。其余小众不能去者,保南山羌,号小月氏。”而来自于敦煌的月氏人在古希腊著作中被称为“To'kharoi”,即被当代学者认定的“吐火罗人”。他们居住于河西之历史颇为久远。《穆天子传》卷一记载:

“甲午,天子西征,乃绝隄之关隘。己亥,至于焉居禺知之平。”

又《逸周书·王会解》云:“禺氏驹騄,大夏兹白马,犬戎文马。”《管子·地数篇》亦云:“夫玉起于牛氏之边山。”

根据王国维的考证,先秦文献中的“禺氏”、“禺知”、“牛氏”就是后世文献中的“月氏”。依此,则月氏人与中原地区的联系至迟可以溯源至西周时代,其故地至少在公元前2世纪初仍然在河西地区。其国境东至祁连山,西至敦煌。故《史记正义》云:“初月氏居敦煌以东,祁连山以西。敦煌郡今沙州,祁连山在甘州西南。”据林梅村之考证,这里的“祁连山”并非今天的祁连山,实际上是西域胡人所谓的“析罗漫山”。《旧唐书·地理志》“伊吾”条记载:“天山在州北一百二十里,一名白山。胡人名析罗漫山。”而“敦煌”亦并非今日之敦煌。先秦文献所载西域之地名中就有“敦薨”一词,如《山海经·北山经》云:“又北三百二十里,曰敦薨之山,其上多棕楠,其下多苾草。敦薨之水(今甘肃西部之党河)出焉,而西流注于泅泽(即罗布泊)。”从这里可以看出,“敦薨”乃为山名,而敦薨山就是天山东部的最高峰博格达山。是故大月氏人的故乡

^①参见林梅村:《汉唐西域与中国文明》,文物出版社1998年版。



在今新疆东部天山的巴里坤草原。是故,月氏之东境并不及于今天的甘肃境内。但无论是前说,还是后说,均以月氏之故地是在河西之地无疑。^①

除了大夏、月氏以外,尚有乌孙。《汉书·西域传》“乌孙”条云:“乌孙本与大月氏共在敦煌间,今乌孙虽强大,可厚赂招,令东居故地。”又《汉书·张骞传》亦载:“(张骞)曰:‘臣居匈奴中,闻乌孙王号昆莫。昆莫父难兜靡,本与大月氏俱在祁连、敦煌间,小国也。大月氏攻杀难兜靡,夺其地,人民亡走匈奴。’”黄文弼认为:“按据《汉书·西域传》,是自甘州以西,敦煌以东皆为月氏、乌孙所居。又据《汉书·西域传》乌孙条‘东居故地’之语,《史记》作‘东居故浑邪之地’。按浑邪分地,据《汉书·武帝纪》武帝元狩二年,浑邪王杀休屠王来降汉,以其地为武威、酒泉郡。是浑邪地在今之肃州,休屠地在今之凉州;汉招乌孙居浑邪故地,是在今肃州一带,原为乌孙故地。据此,是乌孙与月氏分地,乌孙在肃州以西至敦煌,月氏在肃州以东至张掖。”而且,乌孙与月氏共居敦煌、祁连之时期,亦当在战国、秦汉之际。

由此可见,远在先秦时代,秦凉地区,也就是后来的河西走廊,与中原和江南地区一样,不仅有着悠久的史前文明,而且出现了不同种族间相互交替之历史活剧,大夏人、月氏人、乌孙人……虽然在血与火的种族拼杀中游离西域,但他们之文化沉淀亦创造了独特的中国西北部文化,给中国传统文明注入源源不断的新鲜血液。

第二节 羌族的家乡

秦汉之际,华夏文明经历了十分艰难的历史撞击,终于确立了崭新的专制主义中央集权政治体制,开创了中华民族发展之新篇章。而在秦凉、河西之地,亦经过了剧烈的种族抗争,最后,西羌诸种与匈奴成为了该地的新主人。

^①参见黄文弼:《西北史地论丛》,上海人民出版社1981年版,第123~129页。